

王宏志◎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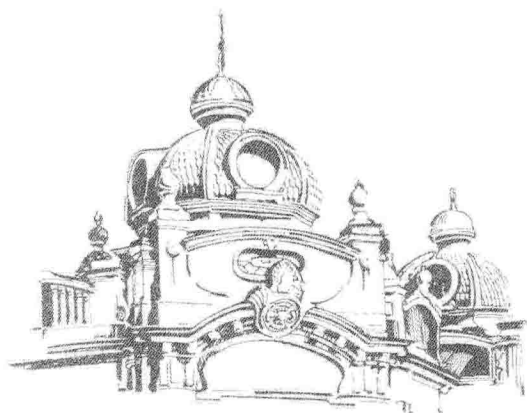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2013

翻译史研究 2013

本书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学术论文集，以“翻译史研究”为专题，收录了众多学者在该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第三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 主辦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2013
翻译史研究 2013

王宏志 主编

 香港大學出版社

 翻譯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史研究(2013)/王宏志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2
ISBN 978-7-309-10186-7

I. 翻… II. ①王… III. 翻译-语言学史-研究 IV. H05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6525 号

翻译史研究(2013)

王宏志 主编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春秋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1.75 字数 347 千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186-7/H·2190

定价: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翻译史研究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主办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

出版及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主 编

王宏志 WONG Wang Chi Lawrence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副主编

关诗珮 KWAN Sze Pui Uganda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序)

陈思和 CHEN Sihe

复旦大学中文系

黄克武 HUANG Ko-wu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志德 Theodore D HUTERS

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亚洲语文及文化系

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哈佛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系

王宏志 WONG Wang Chi Lawrence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王小明 WANG Xiaoming

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邹振环 ZOU Zhenhuan

复旦大学历史系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序)

朱志瑜 CHU Chi Yu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关诗珮 Uganda Sze Pui Kwan(执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李奂学 LI Sher-shiueh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沈国威 SHEN Guowei

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

沈安德 James ST. ANDRÉ

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系

王克非 WANG Kefei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

叶凯蒂 Catherine YEH

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及比较文学系

出版助理

张梦媛 ZHANG Mengyuan

目 录

大红毛国的来信：马戛尔尼使团国书中译的几个问题	王宏志	1
认识中国：小斯当东与图理琛《异域录》的翻译	游博清	38
四不像“大英(国)”：大清天朝体制钤压下的汉译泰西国名	庄钦永	59
英法《南京条约》译战与英国汉学的成立 ——“英国汉学之父”斯当东的贡献	关诗珮	128
插图翻译和基督教的本色化 ——晚清汉译《天路历程》的插图研究	姚达兑	165
从《天演论》到《原富》：以严复、吴汝纶的书札为素材的考察	沈国威	190
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的邝其照	邹振环	208
游走于国族叙事和小叙事之间：清末民初的夏洛蒂·科黛 (Charlotte Corday)形象研究	唐欣玉	247
作为20世纪60年代翻译史事件的《拉奥孔》汉译本出版 ——以出版社、大学与科学院的若干人物为中心的考察	叶 隽	274

译学新芽

重构“小说场域”的性别秩序 ——以清末民初西方“女小说家”的传记译介为中心	马勤勤	290
--	-----	-----

外国翻译史论文选译

朝墨西哥谷进发：玛丽娜女士(玛琳哲女士,1500-1527)

弗朗西丝·喀尔登尼(著) 萧若碧(译) 318

稿约 339

撰稿体例 340

大红毛国的来信： 马戛尔尼使团国书中译的几个问题*

王宏志**

摘要：毫无疑问，1793 年的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1737-1806）使团访华，在中英交往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过去，不少学者对这重大历史事件作过研究，提出不同的论述和评价，但一直被忽略的是当中所涉及的翻译问题。此外，由于史料的匮乏，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其中十分值得深入探究的是马戛尔尼所带来的英王乔治三世写给乾隆的国书的中文译本，因为这是乾隆所能接收直接来自英国人的讯息，足以影响他对使团以至英国的理解。

本文揭示一些过去未被发掘或没有注意的史料——包括一份一直藏于英国外交部档案的国书中译本，深入讨论英王国书中译本的几个重要问题：国书中译的过程是怎样的？中译本的译者是谁？国书最早的中译本是怎样的？它跟过去故宫军机处上谕档所藏的〈译出英吉利国表文〉有什么分别？当中的改动是谁做的？这些改动的意义又在哪里？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对马戛尔尼使团的理解将会有更准确和深刻的理解。

关键词：马戛尔尼使团；斯当东；李自标；柯忠孝；蒙突奇

* 笔者自 2003 年开始关注马戛尔尼来华使团所涉及的翻译问题，2009 年发表〈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3 期[2009 年 3 月，页 97-145]）。论文发表后，仍陆续找到新的材料，足以对该文的部分论点再作补充和修正，其中包括台湾清华大学东印度公司商业史专家游博清博士慷慨提供两份重要资料（英国外交院所藏英王国书中译本及蒙突奇 1801 年自撰年表），谨此致谢。

** 王宏志，工作单位：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及翻译研究中心，电邮地址：lwcwong@cuhk.edu.hk。

Letters from the Red-Haired Barbarian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Letter of Credent of the Macartney Mission

Lawrence Wang-chi Wong

Abstract: No doubt, the Macartney Mission of 1793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Sino-British relationship. Because of its long-term impact, many studies have been made on the mission. But for a long time, one key issue has been largely overlooked: the role played by translation in the Mission. Among the many problems, there wa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tate letter brought by Lord Macartney from King George III of Britain to Emperor Qianlong. This is of prime importance as the translation was the only text read by Qianlong that came directly from the British.

By digging into first-hand materials that have not been consulted, including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tate letter from the archive of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several basic ques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tate letter. How was the letter translated? Who translated it? What was the earliest version of the translation? In what way was it different from what all historians have so far consulted, the one kept in the Imperial Palace of the Qing? Who made the changes? What significances were made by the changes? It is hoped that a more accurate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acartney mission can be reached after these questions are handled.

Key words: Macartney Mission;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Jacobus Li; Paolo Cho; Antonio Montucci

毫无疑问,1793 年的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使团访华,在中英交往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过去,不少学者对这重大历史事件作过研究,提出不同的论述和评价^①,但一直被忽略的是当中所涉及的翻译问题。笔者曾在 2009 年发表过一篇讨论马戛尔尼使团翻译问题的文章^②,算是比较正式地探讨到这重要的课题,但由于史料的匮乏,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其中十分值得深入探究的是马戛尔尼所带来的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1738-1820; r. 1760-1820])写给乾隆(爱新觉罗弘历, 1711-1799, r. 1736-1795)的国书,因为这是乾隆所能接收直接来自英国人的信息,足以影响他对使团以至英国的理解。

本文通过揭示一些过去未被发掘或注意的史料,深入讨论英王国书中译本的几个重要问题:国书中译的过程是怎样的?中译本的译者是谁?国书最早的中译本是怎样的?它跟过去故宫所藏军机处上谕档中的〈译出英吉利国表文〉有什么分别?当中的改动是谁做的?这些改动的意义又在哪里?通过回答和分析这些问题,我们期望能对马戛尔尼使团有更准确和深刻的理解。

关于乔治三世国书的英文文本,今天很容易便可以在 H. B. Morse (1855-1934) 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里见得到^③;另一方面,20 世纪 20-30 年代北平故宫博物馆所编辑的《掌故丛编》里,收录有〈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里面便包括了〈译

① 较重要的包括:Alain Peyrefitte, *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zations: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 in 1792-1794*, Jon Rothschild Tr., (London: Harvill, 1993);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J. L. Cranmer-Byng,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Peking in 1793,"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4, Issues 1-2 (1957/058), pp. 117-186; Robert A. Bickers, ed. *Ritual & Diplomacy: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1792-1794* (London: The Wellsway Press, 1993); 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8 本第 1 分(2007 年 3 月),页 35-106; 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赵刚:〈是什么遮蔽了史家的眼睛?——18 世纪世界视野中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视界》第 9 辑(2003 年 2 月),页 2-28。

② 王宏志:〈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3 期(2009 年 3 月),页 97-145。

③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vol. 2, pp. 244-247.

出英吉利国表文)①。相同的文本后来也见于199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辑出版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内②。一直以来,我们认定了这就是乔治三世国书的中文版本。这样看来,国书的中英文本问题似乎早已得到解决。

我们暂且先把文本的问题搁下,先行讨论另一个重要问题:乔治三世的国书是谁翻译成中文的?对于这一问题,学者有着不同的说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秦国经在两处不同地方这样说:

英国王向乾隆帝遣使祝寿的表文,由索德超全文译出后,于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一七九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进呈乾隆帝阅览。③

当英使团离开热河之后,八月十九日,乾隆皇帝接到了由钦天监副索德超翻译的英国国王表文。④

秦国经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专责整理故宫有关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档案资料,负责主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他的说法自应有其权威性的。不过,尽管秦国经在这里说得很明确,但其实在这两处地方他都没有提出任何佐证,说明资料的来源。我们知道,索德超(Joseph-Bernard d'Almeida, 1728-1805)是葡萄牙籍传教士,早在1759年便来到中国,一直留在北京,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他任钦天监副,获委为“通事带领”,赏三品顶戴⑤。尽管他在8月23日跟使团见面后给马戛尔尼等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⑥,但在使团访华期间还是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例如马戛尔尼在热河跟乾隆见面时,索德超仍然被派往那里担任翻译,甚至马戛尔尼等候乾隆接见,也是由他负责带领的⑦。另外,他

①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掌故丛编》(台北:国风出版社,1964年重印),页76-78。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页162-164。

③ 秦国经:〈从清宫档案,看英使马戛尔尼访华的历史事实〉,《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页75。

④ 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页142。不过,该书有关译者的部分是很有问题的,他把Mr. Plum说成为“亨利·培林先生”,“此次他任使团助理秘书”;又把两名中国传教士译者视为一人,变成“卓保罗·李雅各(即柏仓白)”,此次他任使团翻译”,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同上,页36。

⑤ 〈上谕英使远来着令监副索德超前来热河照料〉,《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页10。

⑥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Hamden: Archon Books, 1963), pp. 93-94.

⑦ 根据和珅的奏折:“臣和珅同礼部堂官率钦天监副索德超带领英吉利国正副使臣等恭逢”,〈内阁大臣和珅奏英使于热河觐见皇帝的礼仪单〉,《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页600。

也的确参与了文书翻译工作,例如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十七日,军机处档案记有马戛尔尼的信函已交给索德超翻译出来^①;他又负责查核其他人的翻译是否准确,当中包括马戛尔尼送来的呈词以及乾隆写给英国国王勅谕的翻译^②,更专门察看马戛尔尼赠送的仪器运作情况^③,可见他的确是受到重用的,这是因为他曾经治愈了和珅(1750-1799)的脚疾的缘故。可是,关于英王国书经由索德超所翻译的说法,一方面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明确的史料记录——整部《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里都没有提及索德超翻译英国国书的事;另一方面跟我们所见到的一些原始资料相冲突,原因在于使团的正副使都明确告诉我们,国书译文是直接由英国使团所提供的。

根据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的日志和回忆录,从使团刚抵中国开始,派来迎接他们的中国官员乔仁杰和王文雄便曾再三要求拿取这份国书,但却一直遭到马戛尔尼的拒绝,坚持要直接把国书呈交皇帝^④。斯当东这样说:

我们认为最起码要待到大使到达首都后,才把英王陛下的信呈递出来,会是较为郑重和得体的。因此,我们回答说,信件原文和译稿都锁在一个金盒子里,会直接呈递到皇帝的手中。^⑤

证诸清宫档案,征瑞在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1793年8月3日)曾上奏,前派乔人杰王文雄出海“查看表文贡单”,但结果英方只答应译出贡单,“表文未经呈出”,征瑞这样回报:

该贡使坚称并无副表,本国王亲自封锁匣内,必须面呈大帝,方见其诚,此

① 《奏为英贡使所递西洋字禀已交索德超译出呈览》,《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页198。

② 《奏报将英使呈词交索德超阅看谕英法交恶皇帝无分厚薄洋人钦佩情形》,同上,页203;《奏为颁给英国王勅谕已交索德超等阅过无误事》,同上,页145。

③ 《为奉旨传谕选派学习安装天文地理表并已领会修理方法者来热河的启文》,同上,页146。

④ *An Embassy to China*, p. 120.

⑤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Philadelphia: Robert Campbell, 1799 [Original Edition, London: Stockdale, 1797]), vol. 1, p. 242. 不过,斯当东的这部回忆录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本文统一使用上开版本。另外,现在中文学界主要征引的中译本为: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上海书店,2005)。但本文会直接使用英文原著,除特别注明外,所有中译均为笔者所作。

时不敢擅开。^①

不过,在回忆录较后的部分,斯当东又说曾经在八月初四日(1793年9月8日)把国书的中译本交给了和珅,和珅看过后显得相当满意^②。这与马戛尔尼的说法有分歧。据马戛尔尼说,他是在八月十日(9月14日)觐见乾隆时亲自把放在一个镶有钻石的黄金盒子里的国书直接送到乾隆手上的^③。至于八月初四日,马戛尔尼在当天的日志里说,斯当东回来后向他报告说和珅很想知道信件的内容,因此答应送给他一个副本;两天后,马戛尔尼与和珅见面时还说期待能够尽快把英王的信直接交给乾隆^④。换言之,自始至终国书都没有交给和珅。但无论如何,使团正副使的描述都足以显示,国书的中文版本是早已由英国方面自己准备好了的。

那么,究竟是英使团里什么人把英王国书翻译出来的?法国学者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曾做过这样的推想:

这篇译文可能出自安神甫之手,他是与英国人同舟来华的四位中国人之一;译文大概完成于航行途中。“特善写汉字”的安神甫,为翻译大使抵华所需文件提供了帮助后,在澳门离船上岸。^⑤

戴廷杰这里所说安神甫“特善写汉字”,其实是来自斯当东的回忆录。在回忆录里,斯当东提到有四名中国人随团回到中国来,除了原来聘用的两名译员外(关于这两位译者,下文马上会作交代),还有译员的两位朋友。斯当东没有点出这两人的姓名,但确实提到了其中一位特别长于书写汉字,且在旅途上经常协助使团做翻译^⑥。另一方面,马戛尔尼在6月22日的日志里提到两名随船回国的传教士,在到达澳门后便离船,他把这两名传教士称为Padres Nyan and Vang^⑦。戴廷杰所说的安神父——还有另一位法国学者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所说的“Father An”^⑧,就是马戛尔尼所说的Padre Nyan。不过,这位在旅途上一直帮忙翻译,且“特善写

① 〈长芦盐政征瑞奏报在海口办理接待英贡使情形折〉,《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页351-352。

②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2, p. 67.

③ *An Embassy to China*, p. 122.

④ Ibid., pp. 118, 120.

⑤ 戴廷杰:〈兼听则明——马戛尔尼使华再探〉,《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页131。

⑥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 p. 191.

⑦ *An Embassy to China*, p. 64.

⑧ Peyrefitte, *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zations*, pp. 5, 30; 不过,这是英译本的说法,而在该书的索引里, Father An 后面以括号加上了 Ngan。

汉字”的 Nyan 神父其实并不是姓安,他的名字叫严宽仁(1757-1794)。在过去,我们对于英使团中的几名中国传教士的名字和身份没有弄清楚,所有的资料都只来自使团成员的回忆录,结果,人们就只知道他们的英文名字,这包括了斯当东在使团出发前专门聘回来做使团译者的两名中国教士。过去以中文写成的文章都把这两位译者叫作周保罗和李雅各,这是直接从英使团成员回忆录翻译过来的,因为他们出现在这些回忆录时是分别被叫作 Paolo Cho 及 Jacobus Li(又叫作 Jacob Ly, Plumb 先生)。今天,通过方豪的一篇探讨清初出国到欧洲留学中国学生的论文,我们已能确认他们的中文名字是柯宗孝(1758-1825)和李自标(1760-1828)。柯、李二人都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离开中国,到那不勒斯学习修道的,那次同行出国的共有七人,当中包括同船回国的王英(1759-1843),也就是马戛尔尼所说的 Padre Vang“王神父”了^①。至于严宽仁,他是福建龙溪仁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20 岁时出国到意大利去,1792 年跟随使团同船回国,在澳门登岸,但在两年后便去世了^②。戴廷杰以为英王国书是由严宽仁所翻译,其实只不过是根据斯当东说他在船上经常协助使团做翻译而猜想出来的,当中并没有提出过任何证据——从上引文已见到,他只说是“可能出自安神甫之手”。然而,这猜想也是错误的,我们很难想象使团没有做好一切准备便仓促出发,然后在航海途中才把国书匆忙翻译出来。事实上,英王乔治三世写给乾隆的国书中译本并不是在旅途上才着手翻译的,而是早在使团还没有出发前在英国便翻译出来了,参与其事的主要就是斯当东从意大利那不勒斯专门聘回来的两位使团译者柯宗孝和李自标,另外还有一意大利籍汉学家蒙突奇(Antonio Montucci, 1762-1829)。

关于柯宗孝和李自标这两名中国教士,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也很少,只有从使团成员的回忆录去知道他们曾为使团做过什么。不过,从使团成员的记录里,从没有说过国书是由这两名传教士所翻译的。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斯当东。我们知道这两名中国教士是他从意大利那不勒斯传道会(De Propaganda Fide)所办的一所华人书院(College for Chinese)找回来的。在现存斯当东那时候的书信里,其中有一封是由英国派往那不勒斯的大臣 Sir William Hamilton 在 1792 年 2 月 21 日自那不勒斯写给他的信,内容便是有关找寻中国译员的。Hamilton 在信里说,他跟这所中

① 方豪:《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学生书局,1969),上册,页 382-383。

② 同上,页 383。

国修道院的长老熟稔,因而知道当时在书院里有四名已修学完毕的中国人,正要准备回国,他们学会了拉丁文,也许其中一两人会被“您那非常优厚的条件所吸引”,愿意服务,但 Hamilton 又指出,这些教士回国一般都是会回到澳门去的,如果跟随使团直接到北京,他们可能会感到忧虑,甚至害怕会被处死,特别是他们最近刚收到从中国来的一些信,里面都谈到朝廷对宗教的约束越来越严厉。因此,他要求斯当东尽快到来,直接跟这些中国教士商谈^①。斯当东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曾仔细谈过怎样在接到出使任务后便马上开始去访寻译员,甚至跑遍欧洲,最后才经由 Hamilton 从那不勒斯传道会找到这两名懂意大利文、拉丁文和中文的中国传教士来充任使团的翻译;他还记录了他们抵达英国的时间——1792 年 5 月。显然,他在收到 Hamilton 的信后便马上赶去那不勒斯,且很快便成功把这两名中国人说服及带到英国来。此外,回忆录里还讨论了这两名译者建议购买什么礼物送给中国的官员,但就是没有谈到国书的翻译^②。如果这样,英王的国书究竟是不是这两位使团译员所翻译出来的?

现在所见到最早、最明确地说出了这份国书的译者身份的是一名来自英国北安普顿郡的新教牧师 William Willis Moseley,时间是 1798 年,离开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才不过五年。在一本 1842 年在伦敦出版有关新教在华传教的简史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里,他一开首便全文抄录了自己在 1798 年所写的一封通告(“circular”),说明当时自己已经开始在英国组织人手把圣经翻译成中文,Moseley 认为这份通告是新教中译圣经的源头。在通告里,他谈到当时很多人认为中文太困难,且缺乏资金和人才去把圣经翻译成中文,但他接着便援引了马戛尔尼使团国书的翻译来说明把英文材料翻译成中文是很可能的。他这样说:

英皇陛下写给中国皇帝的谕旨,就是蒙突奇博士在斯当东爵士从那不勒斯传道会延聘来做使团翻译的中国罗马天主教士的协助下,在这个国家翻译成中文的。

(The memorial of his Britannic Majest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was

① Hamilton to Sir George Staunton, 21 February 1792. 这些珍贵的书信藏于 Duke University, 经由 Adam Mathew 制成微卷。

②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1, pp. 21–22.

translated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is country, by Dr. Montucci, assisted by native Roman Catholic Priests, who had been engaged by Sir George Staunton at the Propaganda Fide, in Naples, to accompany the embassy as interpreters.)^①

而在该书的另一处地方,他又提到了蒙突奇,并再一次说他曾经协助翻译英王的国书(“had assisted in translating the memorial of his Britannic Majest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虽然这次并没有提到来自那不勒斯的两位译员^②。如果是这样,蒙突奇便是英王国书的中译者了。然而,Moseley 的说法是否准确? 他的权威性在哪里?

关于这位 William Willis Moseley 的资料,我们掌握得很少,只知道他也曾经编写过一本有关拉丁文发音的字典^③。不过,从上面提到的那本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看,我们知道他的确在最早推动基督教来华方面做出过很大的努力和贡献。首先,他把这封“通告”寄送给一些热衷的基督徒,然后又辗转传出去,引起了注意,收到大量的来信,尽管有些意见是较消极负面的——包括来自东印度公司董事 Charles Grant——但他并没有放弃,继续四处向人借阅书籍来认识中国及学习中文,更获介绍认识了一些略懂中文的欧洲人,其中一个便是蒙突奇。他又提到,在整个学习中文的过程里,他经常拜访蒙突奇^④。此外,他又在大英博物馆里找到一本《新约》的中文节译本。我们知道,这份名为〈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的译本,最早是在 1737 年由一名任职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 John Hodgson (1672-1755) 在广州发现的,他找人誊抄了一份后带回英国,然后在 1739 年 9 月赠送英国王家历史学会会长 Sir Hans Sloane (1660-1753),译稿后来连同 Sloane 的其他手稿一并收录在大英博物馆的 Sloane Manuscripts 里^⑤。关于这份译稿的译者,经学者考据后,今天普遍认同的看法是法国巴黎外方教会 (Mission Etrangere) 传教士白日升 (Jean Basset M. E. P.,

① W. W. Moseley,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and History of the Events Which Included the Attempt, and Succeeded in the Accomplishment of a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Simpkin and Marshall, 1842), pp. 14-15.

② Ibid., p. 24.

③ William W. Moseley, *A Dictionary of Latin Quantities: Or Prosodian's Guide to the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Every Syllable in the Latin Language, Alphabetically Arranged* (London: Blackwood, 1827).

④ Moseley,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 24.

⑤ Ibid., pp. 41-42.

1662-1707),他在1689年到达广州,然后辗转经过广西,从1702年开始在四川传教。〈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就是在四川的时候翻译出来的^①,因此,这份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新约》节译中文稿本,一般会称为白日升译本。该译本一直放在大英博物馆里,然后在1800年由Moseley重新发现,并在同年写了一篇题为 *A Memoir on the Importance and Practicability of Translating and Printing the Holy Scriptur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of Circulating Them in That Vast Empire* 的报告^②,向英国的宗教人士寻求协助,要求印制该译本并送到中国去。尽管最终该计划被否决(而决定性的意见来自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他认为该中文译本存有问题^③),但这最早的新约中译本后来就成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翻译圣经的蓝本。此外,马礼逊在出发前曾在伦敦学习中文,他的中文老师杨善达(Yong Sam-tak)^④也是Moseley找来的,马礼逊与杨善达的第一次见面,便是经由Moseley带去的,后来,杨善达与马礼逊合力抄写大英博物馆的圣经译本,带到中国去,当中Moseley的贡献的确是

① 最早提出这说法的是Bernward H. Willeke,参Bernward H. Willeke, "The Chinese Bible Manuscript in the British Museum,"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vol. 7, no. 4 (1945), pp. 450-453。

② 苏精把这份报告译作《译印中文圣经之重要性与可行性研究》,并说这小册子曾在1800年出版:William Moseley, *A Memoir on the Importance and Practicability of Translating and Printing the Holy Scriptur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of Circulating Them in that Vast Empire* (London: N. Merriew, 1830 reprint),但这最早版本已亡佚。参苏精:《来华之路:伦敦传教会的决定与马礼逊的准备》,《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页8,注15。另外,从蒙突奇的一篇文章里,我们知道在1801年,Moseley这小册子已重印了第二版。Antonio Montucci, "An Account of an Evangelical Chinese Manuscript in the British Museum, Together with a Specimen of It, and Some Hints on the Proper Mode of Publishing it in London," *Gentleman's Magazine* (Oct-Nov 1801), p. 883, n. b. 这报告后来以附录形式收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p. 95-116。另外,由于Moseley自己没有具体说出发现白日升稿本日期,以致有学者说莫斯理是在1801年发现手稿的。见赵晓阳:《二马圣经本与白日升圣经译本关系考辨》,《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2009年7月),页40。但这是错误的,因为在上文刚提到那篇在1800年出版的报告,Moseley已经明确地提到在大英博物馆找到一份圣经中译稿(页109),且在1800年11月12日,他已经收到一些就这份报告的内容引起的讨论(页26),而另外一封由Rev. David Bogue在1800年12月2日写给Moseley的信里提到,Moseley的报告留在伦敦好几个月才辗转送到他手上(页30)。由此看来,Moseley最迟在1800年10月以前,甚至8、9月间已经发现了这份手稿。

③ Moseley,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p. 61-63.

④ 人们都不知道这位教马礼逊中文的中国人的名字,只根据其英文(Yong Sam Tak)写法音译为“容三德”。最近经张西平据净雨:《清代印刷史小记》所记,他的名字应为杨善达。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上海:上海书店,2001),页353;张西平:《明清之际《圣经》中溯源研究》,收陈春声(编):《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页341。